一个来自百年前澳洲文化包容的启示：E. W. 科尔与《中国人性格中好的一面》[1]

王敬慧

© 2017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1），19–24 页

大洋洲文学

内容提要：E.W.科尔是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兼出版商。他在“白澳政策”盛行时期的澳洲，勇敢地提出与大众相异的观点，质疑白澳政策的合理性，批判澳洲白人对亚裔、特别是华裔人士的歧视。他在1905年出版的《中国人性格中好的一面》，指出中国人并非“野蛮人”，其被排斥的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对异质文化的恐惧。本文将以该文本为例分析文化歧视的根源与实质，从中英词源分析角度，分析谁是真正的Barbarians（野蛮人）；同时探究《中国人性格中好的一面》与中国民族精神的关系。对该文本研究旨在寻找其对当下难民问题盛行、异质文化之间理解困顿的启示与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科尔文本所提出的解决冲突的方案是回归人性——“善良”，“爱”与“同情”。尽管他的超越时代的想法在当下还没有实现，但是他本身的出版经历，特别是儿童书籍的出版，体现了人性的力量，延展了人类的视野。

关键词：野蛮人 人性 恐惧 中国民族精神 科尔

WATERMARK

一本70年后被官方证明正确的红皮书

1788年1月26日一群在英国不受欢迎、被流放的英裔白人登陆悉尼并建立英联邦在澳洲大陆的第一个殖民地。如果从这个时间点算起，在澳洲逐渐形成的六个殖民地等待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到了1900年，才联合起来，讨论成立统一的联邦国家。但是，当时的联邦在多方面仍然从属于英国，比如，它需要通过英国议会颁布“澳大利亚联邦宪法”和“不列颠自治领条例”，才能获得法律上的认可。1901年1月1日，当澳洲各殖民区改为州，澳大利亚联邦正式成立，并通过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为澳大利亚人的权利而制定，但是其中的移民限制法案，则体现了在澳洲站稳脚跟的英裔白人如何将他们的种族歧视进一步扩展。在建国前，对于澳洲的白人殖民者，可见的与习以为常的是对土著人的迫害与消灭；而建国后的这一移民法案则是要限制与其文化不同质的非欧洲移民的进入。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尽管亚裔与太平洋群岛族裔是被歧视的，但是那还不是一种官方的行为。但是1901年之后，这种歧视被新的政府合法化，他们运用苛刻的语言测试将许多非欧裔移民排斥在澳洲之外。而当时的宗主国，对此是支持的，比如英国官方人士称：“我们很同意这些决定……这些殖民地不应让大批来自不同文明、宗教方面和风俗习惯的人大量涌入，因为他们将会严重干扰现有的劳动人口的合法权利。”[2] 澳大利亚联邦的第一任总理埃德蒙·巴顿宣称人类平等的原则只适用于英国人之间，英国人跟中国人之间则不遵循这条原则。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鼓吹之下，在随后的十几年间，华裔移民不能合法进入澳洲，而在澳洲的华裔则受到更多的歧视与排斥，单单在墨尔本，唐人街的规模从4个街区缩小到1个街区。

1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6ZDA200。
2 做此陈词者是当时的殖民地要员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Speech to Colonial Conference of 1897, quoted in J. Holland Rose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VII*: Part I: Australia (1933), p. 411.

正文.indd 19 17-12-14 下午4:49

总结殖民者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他们先是将土著人看作异类，打压与消灭，告一段落后又将其他非白人移民当作异类来排斥。殖民地白人自觉高高在上的种族优越感是一种有传染性质的心理疾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英国移民都是如此。比如，本文的研究对象——爱德华·W. 科尔（Edward W. Cole, 1832-1918），他也是一位英裔移民。1850年他从英国肯特郡飘洋过海到了南非殖民地开普地区，1852年他又来到澳大利亚的英属殖民地维多利亚[1]，在这里定居一直到去世，他的墓地位于墨尔本克佑区（Kew），该区域目前是墨尔本教育水准较高的地方，从小学到高中，各种公立与私立学校林立，学术气息浓厚。这与科尔的愿景是一致的，因为科尔一生致力于民智的教育与培养。在19世纪维多利亚淘金热潮中，科尔移民到维省，他在金矿开过买卖，在街上摆过摊位，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积累财富，而是让财富发挥更积极的价值。所以他将自己的财富致力于图书创作、出版与销售事业。1903年，白澳政策弥漫的背景下，他在自己创建的出版社、自费出版了一册红色封皮的小书，书名是《白色澳大利亚问题》（*The White Australia Question*）。在书的封面上，他同时列出了书中的四篇文章的题目：1. 白色澳大利亚是不可能的；2. 人种肤色差异的原因；3. 整个人类是混合的；4. 黑人。科尔在文中用科学的观点说明人肤色的差异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人类社会中，白人只是各类人种中的一类，并没有优于常人的基因。他从欧洲人基督教义的博爱说起，认为白澳政策是对基督教义的彻底否定。他甚至认为耶稣也可能是黑人。总之，该书中的许多观念，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当下读起来，仍然令人感受到其观点的前卫与敏锐。但是这也不能改变白澳政策在澳洲的实施。该政策直到1972年，才正式被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废止。这也就是说，该书在出版之后，等待了70年的时间，经历很多代人，其观念一直与政府的政策相左。他的观点不能被官方所接受的遗憾，从某个角度上反映了他的心智要比他当时所生存的年代更为成熟。

百年前中国传统文化在异域的影响力

他对白澳政策的批判还体现在他在1905年出版的《中国人性格好的一面——它与白澳政策的关系，以及澳洲热带区域的发展》（*Better Sid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ts Relation to a "White Australi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ur Tropical Territory*）。[2]这本书关注的是白澳政策对华人淘金工与昆士兰甘蔗园的大洋洲美拉尼西亚人（被蔑称为"Kanaka"）的不公正对待。最初，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白人的体质不适合从事热带地区的工作，他们引进了很多美拉尼西亚的廉价劳工。其中许多美拉尼西亚人甚至是被劫掠到澳洲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吃苦耐劳的美拉尼西亚劳工进入，白人开始恐惧，随后政府和工会达成协议，在1890年代就有大约7,000美拉尼西亚人被政府驱逐，然后他们只允许白人劳力从事农场的工作。尽管是关于两种弱势群体，但是科尔的这本书，主要侧重点在于对中国人性格中好的一面的探讨。这一点，从书名的表述就可以看出。

尽管许久以来，基于许多原因，其他文化对中国文化或中国人的认识了解不全面，甚至不正确，但科尔的这个文本体现出他对异质文化的尊重与包容态度。他能看到新成立的联邦政府在摆脱宗主国的政治束缚与压迫的同时，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出台了压迫他国非白种移民的不人道的白澳政策。 作为一个思维敏锐和明辨的观察者，科尔在许多澳大利亚人说"中国人是劣等的外国人，是黄皮肤、长相平平、不讲卫生、吸食鸦片、沉迷赌博、不讲道德、胆小怕事、喋喋不休的异教徒，工资给多低都干活，浑身一股油抹布的味道"时，勇敢地指出，"中国人像我们一样也是人，总体来说，他们不是坏人，而且远比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还要好。"他认为，"如果中国

1 殖民地维多利亚的首府城市是墨尔本。

2 该书电子版见http://adc.library.usyd.edu.au/data-2/fed0049.pdf，本文所有对该书的引用都出自这个版本。访问日期：2016年10月1日

正文.indd 20 17-12-14 下午4:49

人有过和其他人一样的衣食住行和教育环境，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人不会有多大的不同。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在一个英国社区长大，吃住一样，都受到过英式教育，都用英语表达自己，那么，他们和我们不会有不同。”他的这种观点自然令中国人想起中国蒙学里必然提到的“性相近，习相远”。在这本书中有许多地方都体现着科尔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理念的尊重与借鉴。

那么是什么让一个世纪前的一位澳大利亚白人写出一本为中国移民说话的书籍？这其中有作者本人的人文素质因素，同时也有着中国民族精神感召力的影响。过去到澳洲的中国淘金工，工作辛苦，但是任劳任怨，积极肯干。这与一些欧洲人很早就已经接受的工作8小时、享乐8小时、睡眠8小时的理念是不同的。中国人的精神可以用很多形式来表述，不过很多学者都认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个字体现着中国的民族精神[1]。笔者认为对于当时背井离乡去澳洲淘金的穷苦人，还应该加一句，就是他们相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许多去澳洲淘金的中国人，后来回到中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比如永安百货的创始人郭氏兄弟，早年到澳洲闯荡积累了原始资本，在20世纪初，澳洲白澳政策开始官方排华之际，回到中国创立了永安百货公司，在香港与上海都有大规模的百货公司与加工企业，开辟了中国百货行业的先河。[2]实际上，科尔本人用财富培养国民智力的做法，也与此类同。除了“性相近，习相远”这样的概念表述，科尔的《中国人性格中好的一面》一书中还有很多地方提到或显示了他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推崇。比如，他引用曾在中国传教的E. J.杜克牧师的经验之谈：“千万年的伦理道德指导，特别是关于谨言慎行（中国儒家思想以及信仰者喜欢的劝诫表述）的作用对中国人的影响很深。”然后他也借用另一位社会人士格拉斯顿先生的话：“中国人被排斥，不是因为他们的邪恶，而是因为他们的美德而让人感到恐惧。”

排华根源在于对异质文化的恐惧

在这里科尔敏锐地指出了澳大利亚排华的根源：对异质文化的潜在恐惧。分析澳大利亚的排华原因，其中有文化与经济方面的双重原因。从文化差异上看，当时到澳大利亚的白人移民多信仰某种宗教，并将自己归属于其门下，属于一神教，而中国人在五千年文明的教化之下，自然科学常识知识的掌握已经非常发达，不需要把某一个神看作是创造世界、主宰人类命运的力量。《易经》可以证明了中国人已经在几千年前就可以看到古人对天体与自然的透彻理解，比如《易经》中最基本的乾卦与坤卦讲：“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这里面体现的内容也是现代中国人仍然延续着的成熟且完善的民族精神，也就是说当各种一神教说神会给人力量时，中国人已经知道自己要像天上的行星一样永动而不停息；当西方宗教训诫人们应该做善事，否则会被惩罚时，中国人明白自己要像大地一样有包容性，让万物生长。这种包容性也体现在中国人对各种宗教和思想家采取兼收并蓄的方式。而老子会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多年来，中华文明属于一种融合型文明，诸子百家争鸣，儒释道三种宗教各有特色，可谓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并充分体现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相对而言，来自西方的神代表了一种单质的、排他性的宗教在中国确实很难发展下去。澳大利亚排华人士看到华裔移民不像他们一样信奉某一个神，就武断地说中国人是“没有灵魂”的人，这是毫无依据的。但是因为当时清政府的羸弱，尽管中国文化相对当时的澳大利亚殖民地文化完全具有竞争潜力，但是却没有竞争实力。当然文化差异并不是排华风潮出现的唯一原因，再往深处探究，实际还是经济原因，华人实际上成为了当时澳大利亚（主要是维多利亚省）淘金业发展速度放缓的替罪羊。从华人听说维多利亚有金矿的消息，到经历漫长的越洋跋涉从中

1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93页。
2 谭仁杰，“永安公司创始人郭乐”，《广东文史资料》，第62期（1990年）。

正文.indd 21 17-12-14 下午4:49

国到达澳大利亚，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届时含金量丰富的地表已经被蜂拥而至的先期淘金者挖得差不多了。想要有更多的收获，淘金者就要向地下纵深淘金，力气要用得更多、收入却又在下降，于是后期到达的华工就成了白人收入下降的借口与责难的对象。再后来，淘金热渐渐退却，经济环境恶化，失业白人开始抱怨华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因为华人愿意以较低的工资做较重的活，必然导致他们担心自己的工作不保。

科尔文本的研究价值在于他在一个世纪前，就看到了排华现象中的心理因素体现。先不要说异质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恐惧，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个体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心理学家常说前进的动力来自人生无限的恐惧，乌拉圭作家加里莱诺曾说：不论我们是社会中哪一个阶层的人，“我们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恐惧活着，恐惧落下，恐惧失去工作、车子、房子和财产。”[1]但是本文所分析的是异质文化之间的本能恐惧感。如果我们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研究中文和英文对外乡人的称呼演变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丝端倪。英文中的“barbarian（野蛮人）”源于14世纪中期，拉丁语词源为“barbaria”，含义是“外国人的”；希腊语词源“barbarous”含义是“外国的，奇怪的”；而在希腊语中有一个名词“barbaroi”含义就是“所有不是希腊人的人”，但是到了15、16世纪，该词汇的含义变成了“粗鲁的，野蛮的人”。[2]再看“外乡人”在汉语的表诉。汉语中，“外乡人”或者“异乡人”已经足够表示一种来自异域的群体，但是中原人士喜欢用南蛮来指代来自南方的异乡人。如果我们研究“蛮”字的甲骨文和金文，或者繁体字，它的字形上“蠻”，也就是说，中原人士将南方的异域人士看作一种“应该像虫子一样被捆绑起来的”野蛮人。不论是英文、还是汉语都显示出人类对异域文化的潜在恐惧。这正如赛义德曾经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的，不同民族或国家之间的文化的冲突一定是存在的：“文化逐渐地与民族或国家联系起来，并且具有挑衅性，这使‘我们’有别于‘他们’，这种区别几乎总是带有一些仇外心理。”[3]大洋洲学者查理斯·法莱尔也指出：对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言，“中国曾经是白人不安全感所投射的‘他者’，他们借此来加强对自身白人身份的认同。”[4]

那么对待异质文化的应有态度应该如何？科尔在他的《中国人性格中好的一面》一书中用儒家的表述形式来阐释他的观点。他说：“任何人在对中国人破口责骂之前，如果他希望自己的观点是公正无私的话，应该运用一下这个建议：推己及人（Put yourself in his place）”。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另一种表述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汉英翻译中，译者倾向于将此句与西方圣经传统中的“金科玉律（Golden Rule：Treat others as how you want to be treated）”相提并论。实际上，中西表述有内在区别，前者在思维逻辑链中强调的是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迫别人接受。并没有说自己喜欢的，也希望别人接受，因为其中还可能包含着“己所欲，慎施于人”的内涵；但是西方的表述说自己喜欢的，就要给别人，这甚至可以让某些极端宗教组织以此为借口强迫他人信奉他们认为该顶礼膜拜的教义。

读《中国人性格中好的一面》，人们可以感受到文化的主体是人，因为是人创造了文化，人与人的交流过程就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过程。文化可以分为个人的文化，群体的文化（社会或国家的文化）。个体的文化交流与群体间的文化交流是相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理解与包容的原则也适用于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交流。科尔强调，作为不同的群体的文化，中国文化与澳大利亚文化之间必然存在差异。两国人民所处的背景、所经历事件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待事物的看法、解决问题的手段也会有差异，而只有双方了解这些差异，包容差异，才可能和睦相处。

1 Eduardo Galeano, *Book Upside Down: A Primer for the Looking-Glass World*, Picador; 1st edition, 2001, p.19.
2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1987, p.130.
3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Vantage Books, 1993, p.XIII.
4 Charles Ferrall, Paul Miller and Keren Smith (eds.), *East by South: China in the Australasian Imaginati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5.

WATERMARK

正文.indd 22 17-12-14 下午4:49

科尔图书大厦与科尔的“言行合一”

科尔本人一直在孜孜不倦著书立传，帮助澳大利亚人了解更多的差异，进而发展包容差异的能力。他在墨尔本繁华地段创办科尔图书大厦(1883-1929,该图书大厦所在地目前的商号是澳洲大型百货公司——梅西百货）销售各种各样的图书，鼓励澳大利亚人阅读。为了让穷人、富人、成年人与儿童都可以买到书，他还设计了一些可以在书店流通的徽章奖励，鼓励读者通过阅读获得，并可以用其来购买自己心仪的图书。他的科尔图书大厦销售新书、也销售旧书，书店布置得像马戏团，也真有动物表演或其他文娱活动，所以在当时墨尔本人周末拖家带口去科尔图书书店是一个相当流行的文娱活动。该书店在世界也享有声誉，连吉普林、马克·吐温到墨尔本访问时，都会亲自前往探访。[1]科尔将世界各地的经典儿童读物与图片筛选并编辑成册，取名《科尔趣味图书》（*Cole's Funny Picture Book*），让澳大利亚无数儿童受益，全球销量达几百万册。尽管该书首次出版于1875年，但是现在还可以在亚马逊网站上买到此书的再版[2]。科尔图书公司的儿童图书标识是纵横书籍封面的彩虹条，强调多元之美。该书的第二册图书的封面彩虹条上有三个书店的圆形徽章图案，每个徽章上都有一段文字 ，他们分别是：1. 如果人类要想得到幸福，世界要被真正救赎，那么每一个人都要被教导学会阅读与思考。(The happiness of mankind, the real salvation of the world must come about by every person in existence being taught to read and induced to think.) 2.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你不认识的人与你认识的人一样好。(The people everywhere that you do not know are as good as the people you do know.）3.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互相了解，这个世界没有战争。(If all men throughout the world were acquainted with each other there would be no war.）[3]科尔为图书大厦设计的近百枚此类的徽章，在这些徽章中，还有一枚很有代表性地展现了科尔的思想，因为上面写着“在公元2000年前，会出现一个世界联邦，这里有共同的政府、宗教、语言与货币”。[4]他所希望的应该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唯一的政府、语言或宗教，而是一个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之间真正包容相通的世界。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现在我们已经走过公元2000年，科尔的展望还没有被我们人类实现，他的思想仍然走在前边，将我们这些现代人远远地抛在后面。

关于对待异域人士、特别是移民敌对态度的批判，目前定居澳洲的另一位作家库切的观点值得考虑。他可以想象到这样的未来场景，“人们可以肯定地说，一两代之后的澳洲学童在历史教科书中会读到他们国家祖先在21世纪早期所作的——不遗余力地驱逐亚洲移民的做法是不恰当（不人道）的，但是这些历史书会接着说，好在这种想法已经改变，社会更加开明和进步。我们不用急于批判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还是自己那个时代的孩子。[5]”参照这样的思路，对于科尔的观点而言，我们对人类社群良好状态的理解能力还停留在幼童期，我们仍然需要培养自身对异域文化的包容与尊重。

结论

《圣经·旧约》中的通天塔本来象征着人类对爱的追求，上帝将通天之塔转变成了巴比塔，让语言的差异阻止人类的交流，使人类从亲如一家走向隔阂与争斗。几千年来，世界上发生了无限多的事件，而这些事件的主题又是有限的，用三组词汇就可以概括之——“善良/凶残”，“宽容/

1 http://www.abc.net.au/radionational/programs/hindsight/the-imaginarium-of-ew-cole/2930080 访问日期：2016年10月1日

2 https://www.amazon.com/Coles-Funny-Picture-Book-No/dp/1849024804/ref=sr_1_7?s=books&ie=UTF8&qid=1485188523&sr=1-7 访问日期：2016年10月1日。

3 E.W. Cole, *Cole's Funny Picture Book No.2*, 69th Edition, Vintage, 1976, the cover page.

4 此徽章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博物馆有常规展示。

5 J. M. Coetzee, *The Good Story*, Text Publishing: 2015, p.125.

WATERMARK

正文.indd 23 17-12-14 下午4:49

仇恨”，“理解/误会”。E.W. 科尔在“白澳政策”抬头，排华风潮盛行的时代，撰写《中国人性格中好的一面》，从尊重异质文化的角度，客观分析一种被众人贬低的文化，勇敢地指出中国并非“野蛮人”，并揭露其被排斥的原因是基于恐惧。本文从中英词源分析角度探究了谁是真正的野蛮人。《中国人性格中好的一面》不仅与中国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对当下的局面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与现实意义。目前难民问题盛行、多元文化被诟病，异质文化之间理解困顿停滞的局面，网络信息的畅通并没有带来人类不同群体间沟通的实质改进，人类命运的共同体面临着种种挑战。

本文认为科尔文本所提出的解决冲突的方案是回归人性——“善良”、“爱”与“同情”。他本身的出版经历，特别是儿童书籍的出版，体现了人性的力量。德国语言学家兼文体学家，列奥·斯皮泽（Leo Spitzer）在1934年提出的观点代表着本文的语言文化观：“任何语言先属于人类，然后才属于某个民族：不论土耳其语，法语，或是德语，在它们成为土耳其人，法国人或者德国人的语言之前，它们首先是属于人类的语言。”[1]上帝可以通过混淆人类的语言让通天塔的建造停顿下来，但是人性仍然存在共通性，因为人性的中心——“爱”不是人造的，也不是上帝造的，它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不论是来自东方的，还是来自西方的“人性”，都可以用儒家思想来表达——“仁者爱人”。科尔的文本代表着来自百年前的澳大利亚的一种呼声，至今仍然在期待着回应。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WATERMARK

1 转引自：Emily Apter (2006), *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41.

正文.indd 24 17-12-14 下午4:49